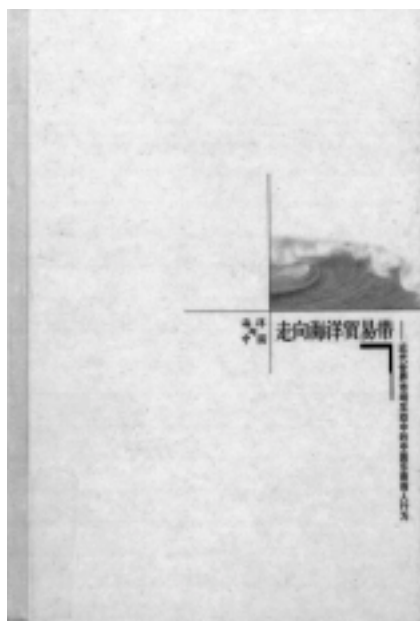


## 從本土走向世界

● 倪樂雄

《走向海洋貿易帶》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將明末清初東南沿海的大規模海上貿易現象置於近代世界市場互動的形成過程中來考察。因此，考察明末清初東南海商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陳東有：《走向海洋貿易帶——近代世界市場互動中心的中國東南商人行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在中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曾一度被忽略。1960年代初，傅衣凌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指出明末清初的東南海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萌芽因素。此後該問題逐漸為學界所重視。1980年代後期，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出版，表明該領域研究已初步成熟。最近，南昌

大學陳東有的專著《走向海洋貿易帶》（下簡稱《走向》）問世，標誌着該研究領域獲得新的進展。

《走向》最有價值的地方是研究視野的成功轉換，這點從目錄編排上就能反映出來。將明末清初東南沿海的大規模海上貿易現象置於近代世界市場互動的形成過程中來考察，為中西文明現代化比較研究創造了條件，並提供了較為詳細的中國方面的背景分析。同時，《走向》也超越了過去同類相關課題的研究水準，並使研究景觀為之一新。

我們知道中華文明屬於大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造就了社會管理的指令性原則。西方海洋文明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經濟之上的，社會管理圍繞市場原則為核心。中國傳統社會中雖有商業經濟成分，但歷來被視為農業經濟結構中的一個部分，是指令性管理下的商業經濟，與古希臘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先鋒型國家市場原則凌駕一切的商業經濟性質迥然相異。根據西方學者麥尼爾 (William H. McNeil) 的觀點：西方走出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的關鍵是市場原則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中國市場經濟雖然在宋代就很發達，但市場原則始終沒有突破以君權為象徵的指令性社會結構。明末清初東南沿

海以市場原則為基礎、極力掙脫指令性社會管理的海上貿易經濟的興起，不僅是對傳統農業經濟結構的挑戰，也是對傳統社會基礎的根本挑戰。因此，考察明末清初東南海商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陳東有着眼於世界貿易的總格局，清晰地理出「互動中的東南中外貿易帶」的市場網絡體系，描述了「東南商人參與世界市場時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不同而呈現的不同層次」（頁60），並進一步理出內層、中層、外層三個貿易帶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剖析了這三個貿易帶在市場網絡中各自發揮的功能（頁62）。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在理論上為探討由明末清初海上貿易所帶來的「新經濟因素」、在傳統農業區域有多大滲透空間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即表明帶有市場原則性質的商業經濟已滲透到華南、華東、華北、華中的廣大區域，與指令性性質的商業經濟並存。從理論上講，一個內地農民的農產品幾經周折最終進入海上貿易渠道，那麼這個農民的商業行為屬於市場原則性質，但在進入海上之前，其商業行為與傳統的商業行為在形式上無法區別。「三層貿易帶」揭示了具有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商業在傳統商業形式掩護下，悄無聲息地在中國內地大規模地滲透、並使內陸區域傳統農業經濟結構中的商業性質發生大規模蛻變的事實。它使歷史教科書的某些觀點作出修正成為必要。

陳東有的研究是在「中國海洋社會」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的，這是他的導師楊國楨十多年前提出的。目

前，國內學界雖反應不強，但以廈門大學歷史系學者為主要的研究群體正在這一總體框架下進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以為「中國海洋社會」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極具價值，它對深入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文化性格的多重性有着重要意義。歷史上的徽商、晉商與東南海商存在很大差別，後者往往發展成商業—軍事混合體。我們還發現：傳統農耕社會的軍隊向來用農業賦稅來維持，作為海商勢力代表的鄭成功集團的軍隊卻用商業利潤來維持。「中國海洋社會」的思路為闡述上述歷史現象，提供了準確的理論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走向》在分析海商社會發育不全時，似乎對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關注不夠。首先，中國海洋社會內部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以明末清初為例，有的海商集團只限於商業活動範圍；有的發展到軍事、商業相結合，官方稱之為海盜；有的甚至發展成商業、軍事、政治三位一體，如鄭成功海商集團。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為參照系，近代化過程是商業、軍事、政治互相支撐、互相擴張形成良性循環的「反饋回路」的過程，這是西方社會相對獨立的「形而下」的子系統。其次，自由、平等、民主等以市場原則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構成「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子系統，並同「形而下」的社會子系統構成更高層次的「反饋回路」。中國海洋社會發育程度最高的是鄭成功海上集團，他們已形成商業、軍事、政治的社會「反饋回路」，儘管這一社會子系統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起着決定性作用，但畢竟還沒有形成與之相吻合的意

陳東有的研究是在「中國海洋社會」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的，這一概念對深入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文化性格的多重性有着重要意義。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海洋社會內部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發展到軍事與商業相結合，官方稱之為海盜；有的甚至發展成商業、軍事、政治三位一體，如鄭成功海商集團。

商業價值體系和傳統道德理想體系在中國海洋社會中是同時並存的，前者因在傳統文化中難登大雅之堂，故儒家文化傳統載體的知識份子，根本不屑於像盧梭等西方知識份子那樣從理論上論證其合理性，使之堂而皇之地佔據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識形態系統，從而形成更高的一層互動和社會「反饋回路」。即使在「形而下」的社會子系統內，法律、金融等體制也欠發達。所以，中國海洋社會中的資本主義發育程度和同時代的西方相比，兩者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如果得出中國海洋社會不存在商業價值體系的結論，似乎不妥。從心理學觀點看，行為與觀念是同步關係，商業行為與商業價值觀是同時發生的，長期而有系統的商業活動必然伴隨成熟的商業價值觀念，只是專制政治將之排斥在意識形態主流之外。所以，儒家理想的道德規範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有絕對優勢，但同儒家天然對立的商業價值觀念是以頑強的人性的天然要求為基礎，人們賴以生存、在現實中所奉行的商業價值體系同儒家理想的價值體系形成嚴重衝突，雙方妥協的社會性、歷史性結果是「說得不做，做得不說」的「文化奇觀」——官方控制的社會意識形態說的是一套，現實生活中人們奉行的和實際做的是另一套，從而造就了社會的普遍虛偽。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長期令人尷尬的現象。

斗膽而論，商業價值體系和傳統道德理想體系在中國海洋社會中是同時並存的，前者因在傳統文化中難登大雅之堂，故儒家文化傳統載體的中土知識份子，根本不屑於像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等西方知識份子那樣從理論上論證其合理性，使之堂而皇之地佔據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商業經濟運作體系同正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來是尖銳對立的，而非西

方社會那樣互相支撐、良性互動。這屬文化性格中的人格分裂現象，可稱之為「文化性精神分裂症」，它至今仍嚴重困擾着我們這個民族，這一文化病癥所造成的災難既是巨大的，又是不易為人察覺的，因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走向》雖然初步涉及了海商社會的意識形態問題，諸如「倫理規範身份」(頁202)、「心靈依賴神靈」等(頁217)，但分析的深度不夠。陳東有所指出的商業行為互動的種種不足和弊端(頁327)，在相當程度上是需要從商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層面來解釋的。今後「中國海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複雜性是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根據韋伯 (Max Weber) 的極端說法：只有在具備了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的地方，才會產生現代化社會。此說雖有偏激之嫌，但考察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不能不涉及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另外，由於傳統史學理論的因素，中國海洋社會內部經濟領域的運作已受到研究者重視，但海洋社會內部其他領域的運作，如法律、軍事、外交、金融等則被忽略。比如，中世紀在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產生的商業契約法在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海洋社會的法律機制和涉及商業的法律機制是如何運行的？澄清這些問題不僅為了還原歷史，更在於同西方文明的比較中認識我們自身的特徵，認識從十六世紀以來我們落後的原因，乃至今天仍落後於西方一大截的根源所在。從這種意義上講，《走向》為此作了紮實的基礎性研究。